

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陈学祖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关键词: 抒情诗性;哲理诗性;原生态叙事;象征态叙事;观念态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3)01-0063-07

作者简介: 陈学祖(1970-),湖南道县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如果以编年顺序一部一部读完沈从文的小说,给我们最为鲜明的印象是其大部分湘西小说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清纯玲珑的人文意象与朴素优美的自然意象,以及渗透在这些意象中的人情风俗共同营构的意境,空灵隽秀,散发出浓浓的情感与悠悠的诗意。显然,浓郁的抒情诗性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重要特征。而在《边城》之后,特别是1934年那次回家探母的影响,使得沈从文创作的湘西小说理想化色彩大大减弱了。因为这次回家使沈从文发现自己执着崇信与苦苦追求的湘西的“人生形式”也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健全与完美,城市生活的浮躁与虚伪和湘西故土的“堕落后”的发现,将沈从文抛入了情感与理智的夹缝和焦虑中。严酷的现实将他从原先崇奉的湘西神话拉回到现实的地面。30年代中期,沈从文开始转向对湘西现实社会中人性的“堕落后”进行痛心的揭示。理想主义者的沈从文虽然从不忘却在小说中倾注些许牧歌情调和抒情因素,但《边城》等小说中所具有的那种浓郁的抒情诗性因素,却从此随着年代的向后推移而渐渐地淡化。代之而起的或是对现实疮痍的忧伤叙述,或是沉入到深邃的灵魂独语与思辩之中去了,思想的灵光遮掩了抒情色彩。那种纯粹的抒情诗性已

微若萤火,再也难以摇撼人心了。沈从文此期的湘西小说赖以打动人心的是那种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忧虑与哲思。小说叙事也由前期的原生态叙事、象征态叙事转入了观念态叙事。因此,如果说《边城》及其之前的湘西小说是意境圆融以意取胜的唐诗的话,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大多是灵智主理以理取胜的宋诗。如果说前者呈现的是一种抒情诗性的话,那么后者呈现的则是一种哲理诗性。这两种诗性均导源于沈从文艺术地把握世界,经营小说的方式。抒情诗性形成于沈从文以原生态和象征态的叙事观照和组织经验世界来营构小说的方式,而观念态叙事在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则使得其部分小说弥漫着思辩的智性灵光。

抒情诗性一:对经验世界的超越

小说的诗性品质就是小说的文体、语言、形象、表现形式诸因素在审美维度上所呈现出的诗意特征。但是“对象世界本身无所谓是不是具有诗意,诗意永远来自于它的观照者和解释者。在小说中则来自于小说家拟设的叙事者,以及叙事者的叙述方式和建构。”^{[1](P79)} 因为无论小说的叙

* 收稿日期:2002-10-16

事者也好,叙事者的叙事方式和建构也好,还是小说家用以观照世界与呈现世界的代言人和言说方式,它们都是小说家意念的呈现,所以,小说的诗性品质最终的根源仍是作家观照与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其本质就是作家诗意观念的审美显现,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便是沈从文诗意观念的审美显现。从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文本来看,其诗性地观照与把握世界,呈现其审美观念的叙事方式大致有三种:原生态、象征态和观念态。

原生态叙事是沈从文前期湘西小说创作最主要的方式。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原生态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诗性叙事,但基本上是以经验世界为依据。经验世界被沈从文作为素材稍加提炼与修整以故事或形象形式呈现于小说中。写于1931年的《从文自传》较为真实而集中地呈现了沈从文的经验世界。其所呈现的湘西世界并不全是清纯素淡超尘脱俗的生命形态,而是沾染了太多的血渍与污浊。那种以抽签判决所谓的“犯人”生命存亡的方式,以及那些血肉模糊的人头和耳朵鲜活地沉入沈从文的记忆深处。^{[2](P22-23)}令人怵目惊心的是,在那个年代,不仅辛亥革命如此,也不仅仅镇 如此,怀化辰溪以及湘西的其它地方一样,当兵的“到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2](P28)}血的泛流和野蛮的杀戮不但使得许多人不知为何而死,也不知为何而活,生命就如野草生长在蛮荒的湘西,随时都可能消失。生活的荒谬与生命的存在形态往往呈现为如此的荒诞剧:“前后两个士兵,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2](P62)}《从文自传》中固然能处处见到质朴野性的生命灵光,但野蛮的杀戮与血的泛流似乎也占不小的比重。沈从文尽管描写如此多的血腥,态度与口吻却极其客观与平静。在沈从文的笔下,野蛮残忍的杀戮似乎只有血,没有欢笑,也没有眼泪。事实上,沈从文并不是没有思考过那种血雨腥风的来源与去处。当他目睹道尹衙门口地上、鹿角上、辕门上无处不是布满肮脏血污的人头和一串串古怪的耳朵的时候,十岁的沈从文惊奇地思考:“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2](P22)}血的泛流与湘西人野性质朴的生命的消失给沈从文留下的并不仅仅只是一道记忆的印痕,而是伴随深沉的思考而化为一种深刻的人生经验。这种经验给予沈从文的是最初初始化的死亡体验。

这种充满血腥的杀戮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的艺术世界中固然也有所表现,但是诗性的观照与把握方式使得这些小说弥漫着浓重的诗性色彩,即使是那些描写战争的场面也诗意化了。没有血渍,看不见残忍。由于诗性的叙述方式,小说中应有的情节却被诗性意象和意境所替代,我们由小说中见到的只有动机与结果,没有过程。小说《新与旧》中曾经在充满血腥的湘西世界风光得意的刽子手,竟因为刑罚中以枪毙代替了砍杀而面临生存与精神的危机和人生的失落。沈从文显然是以一种诗意的欣赏姿态来处理小说

中的血污与杀戮的,忽略过程与情节而着重于结果的诗意描绘,弱化了事件的残酷性,从而使得整个作品显出浓重的诗性色彩。作于1929年的自传性极强的小说《我的教育》中,虽然大篇幅地写到杀头,但所杀的人“不知是不是土匪,不得而知”。杀人的人和看杀人的人关心的只是结果,至于原因和过程对他们的心情的兴奋并没有多大意义。更不会象十岁的沈从文那样发出许多疑问。“杀了一个人后,他们大家全都象是过节,醉酒饱肉,其乐无涯。”^{[3](P130)}“人头是已被士兵们抛到田中泥土里去了,一具尸骸附近不知是谁悄悄地在大清早烧了一些纸钱,剩下的纸灰似乎平常所见的路旁的蓝色野花,做灰蓝颜色,很凄凉地与凝成为黑色浆块的血迹相对照。”^{[3](P131)}诗意的观照与呈现方式使得这一惨景如果没有“凄凉”二字的点化,将会显得被杀者似乎是一种诗意的死亡。

在《从文自传》所描述的沈从文的经验世界里,湘西世界也并不象其小说中描写的那般洁净清纯,人伦和谐,平等相处,而是野蛮而愚顽的。美丽如画的山水养育的却是贫弱与野蛮。野蛮的行为,野蛮的杀戮,野蛮的忽略人的存在构成了湘西人本真的生命形态。在湘西人“看来象是十分近情合理的”事后却隐藏着极度的荒唐与不公平、不合理,只不过没有人去或许是没有闲暇去反思这种习惯的合理性。生活的重压把一部分湘西人抽得如陀螺般飞旋,有地位的湘西人则思考着如何维持自己的财富与地位,贫脊的土壤上生长的是精神的野性、思考的缺失与生命的廉价。生存的艰难与生命的无保障本身就是缺乏人性的,更何况是随意地剥夺人们生存的权利呢?而在沈从文那些表现湘西人情风俗与质朴人性的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生活在一种和乐相处,怡然自得的人际关系中。他们虽然也存在贫富差别,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都能平等相待。即使是那些富甲一方地位显赫的人物,也总是平易近人,乐善好施,从不以势骄人。普通百姓就更是质朴善良,易于接近了。沈从文小说的湘西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冲突,所有的悲剧均导源于自然的灾难或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小说《黎明》是为纪念沈从文的小表弟莽莽而作的,主人公叔远的死虽然并未明言,但不论是死于肺病还是死于河水,都是死于自然的灾难。即使如《石子船》这样隐约透露出政治意味的作品中,八牛的死也是因其潜水摸鱼时,手被石洞咬住所致。所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压根儿就没有缺点,或者说他们的缺点也是美的。这些人物虽然来自于沈从文的经验世界,但是理想化的诗性的观照却使得他们的形象诗意化了。沈从文不愧是写情的高手。他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大量地写作散文和诗歌,因而他总是把他的小说当作散文和诗来写。甚至单就文本来看沈从文的某些小说,我们很难分辨它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在其表现湘西世界的小说中,诗意化的人物、优美的自然意象与纯朴的人情风俗相融合,贯注了作者浓厚的情感和执着的理想,共同构成完美柔和的意境,从而使得其小说弥漫着深重的抒情诗特征。这种诗意特征集中地表现为:(一)强烈的自叙传色彩。沈

从文 1926 年出版的《鸭子》，就是一部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合集，其间各种文体的互生状态极其明显。而此后的《蜜柑》、《入伍后》、《老实人》、《好管闲事的人》、《篁园日记》、《雨后及其他》以及《不死日记》等集子大多也是一种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或散文与小说互渗的作品，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集子中的小说的依据经验世界的原生态叙事特征非常突出，其中的许多小说带有非常强烈的自叙传色彩，都可以从《从文自传》中找到故事和主人公的原型。

(二) 在叙述视角和结构方式上，大多采用第一人称，以回忆姿态来追叙那些具有奇光异彩的如烟往事。(三) 避丑取美的选材方式与诗意的叙事方式。沈从文在其小说中呈现的并不是单纯的经验世界，而是倾注了作者最为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审美体验的。虽然人生体验和审美体验也属于经验世界，来自于经验世界，但经验世界基本上是一种智性认识，而体验却包含着更多的情感因素，是一种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体验是对经验世界的提升与超越。这种提升与超越在沈从文小说艺术中的表现便是原生态的诗性叙事。这种叙事方式的集中的表现是沈从文为了在其小说中建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他总是以避丑取美的诗意方式提炼其经验世界中的社会人事。经由这种避丑取美的选材方式网络的人物和故事本身就具有诗意色彩。(四) 诗性的观照与把握世界的方式。沈从文诗性的观照与把握世界的方式集中地表现为冷处理。他总是以诗意的眼光构筑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在小说文本中大量地选取湘西社会中美好的人性、优美的自然意象、人文意象与清纯质朴富有神秘色彩的民风民俗共同构筑成清幽婉约的意境。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的湘西现实社会在这些小说中只留下了依稀的倒影。沈从文诗性的观照与把握世界的方式还表现在沈从文诗性的叙述方式上，在叙述这些社会人事时，沈从文又总是以散文诗似的笔调，进行各种各样的小说文体实践，在叙述中沈从文理想化地将其经验世界中富有诗意色彩的人物与故事夸大到近乎美妙的境界。因而沈从文前期小说虽然是对其经验世界的原生态叙事，但质朴自然地娓娓叙来却诗意盎然。

抒情诗性二：对经验世界的象征

随着岁月的流逝，沈从文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其小说创作的目的意识也更加明确与强化。其突出表现就是，那种依据经验世界的原生态叙事方式也逐渐减弱。这种趋向较为明显地显示始于 1928 年冬写作的《媚金·豹子与那羊》，经由《神巫之爱》、《龙朱》、《泥涂》、《阿黑小史》等小说集或小说的探索，到《月下小景》和《边城》达于极致。这些小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那种依据经验世界的原生态叙事，而进入纯粹虚构的象征态叙事模式了。所谓象征态叙事，也就是一种超越小说家的经验世界的纯粹理想化的叙事图景。象征态叙事的小说中所呈现的基本上是一个远离现实经验的理想世界。理想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诗性景观，它总是超现实的，因而总是富有诗意的。因此，象征叙事如

果用哲学语辞来表述，即是一种诗意的言说。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纯粹的说”，而“纯粹的被说出的东西就是诗”^{[41] (P73)}。沈从文这一阶段的湘西小说是与我们前述的他的经验世界截然两样的形态。在沈从文的经验世界中的湘西世界是既有牧歌情调又有血渍与污浊的，并且，浸透着野蛮和斑斑血渍的杀戮与忽视人性的现实在沈从文经验世界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种面对死亡的终极追问和人生体验怎么能放逐沈从文的经验世界呢？但是，经验世界只不过是经验世界，它并不妨碍理想的飞腾。相反，理想还得经验世界来支撑，必须在经验世界的肥田沃土上发芽、生长。经验世界既可以被小说家作为素材稍加提炼与修整以故事或形象形式呈现于小说中，如沈从文 1928 年以前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那样以原生态的叙事方式来经营小说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同时，经验世界也可能只是小说家创作小说的契机或参照系，小说的艺术世界不同于作家的经验世界，甚至与作家的经验世界截然相反或对立。如果说原生态叙事是对经验世界的再现的话，那么象征态叙事则是对经验世界的表现。再现是原生态的，如果这样的小说具有诗性品质的话，那么它只能是来自于经验世界本身的诗意因素与诗意色彩或作者对其经验世界的诗意观照。表现则是象征态的，它的诗意特征并非经验世界，而是与经验世界疏离的，甚至是反经验世界的。因此，此类湘西小说的诗性品质导源于小说家对经验世界的象征意蕴的营构。1928 年至 1935 年间，沈从文创作的反映湘西生活的大部分小说属于此类。沈从文此期的小说理想化色彩更为浓郁，充斥于小说中的是浪漫的个人化主观情绪化的象征叙事，现实生活的影子已经变得缥缈渺渺，小说中的世界呈现出一种“乌托邦”的奇景。那种浪漫得近乎奇迹的爱情故事成为沈从文此期许多小说的主干情节。《雨后》写湘西一对恋爱中的青年趁采蕨的间隙到山洞里幽会。沈从文把人物安置到一个充满了温柔色彩的背景之中。小说通过写雨，写树，山洞中的虫声，写人物虽带调皮口气但却充满着野性质朴与怜爱的对话，写人物在山洞中的撒野，甚至还写人物唱山歌念诗。把一个山中的女孩刻划成能歌能诗好象《红楼梦》大观园中的悠娴淑女，人物及其活动的空间均富于诗意色彩。这过于理想化的生活图景显然是作者主观想象的。而雨在这篇小说中富有一种象征意味。小说中不但写雨，还写了云：四狗听到说天气，才想去注意天气一样，望望天。天是蓝分分的，还有白的云。白的云若能说是羊，则这羊是在海中走的。”^{[5] (P94)} 这分明是沈从文对宋玉的《神女赋》中所引的巫山神女故事和《红楼梦》中“雨”的象征意味的一种借鉴。《柏子》和《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写的是另外一种爱情：水手与妓女的爱情。在沈从文理想中的湘西，即使是妓女也有充满着柔情万种的执着爱情，其心中也对自己倾心的恋人充满思念与关心。从她们心爱的水手离开的那天起，就一直牵挂着他，为他在沿途的风里浪里的命运担心，祝福，并默默地计算着他的归期，盼望着与他重见的日子。沈从文同样也是以诗意的笔调深深地挖掘事物的象征意

蕴,用这些富有象征意味的事物来暗示这种似乎不正当但却非常美好的动人情愫。另外,沈从文还常常用象征态叙事来描写爱情悲剧。《媚金·豹子与那羊》讲述的是媚金与豹子双双殉情的悲剧。《边城》中则写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之间的爱情悲剧。诗歌中常用的暗示、隐喻、比兴、象征等象征叙事手法被沈从文大量地运用到这些小说中。沈从文一方面是把那些表现湘西生活的人物和故事描写得尽善尽美,另一方面又通过人物环境中的意象通过比兴、象征、暗示、隐喻等艺术手法层层渲染悲剧气氛,暗示人物的命运,使这些小说所描写的世界清纯优美得远离现实,呈现出浓郁的诗性光辉。沈从文此期所写的《神巫之爱》和《月下小景》尤其如此。现世的爱与神界的爱在这些小说中交相融合,神性与人性相互辉映,使得这些小说恍恍迷离,弥漫着诗意。上述小说的叙事都可以统称为象征叙事。在沈从文小说中,此种手法具有以下特征:(一)设置悬念,将故事的某些细节省略,通过上下文暗示和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的选择,使得文本所表现的意思忽明忽暗,似隐似现,从而拉开了文本与现实的距离,使小说耐人寻味。如《旅店》中描写老板娘黑猫与大鼻子客人的暧昧关系非常隐晦却富有诗意。(二)情节和过程的省略与跳跃。在现实世界中的时空是有序的,时间也不可倒流,但在小说文本中却可以将时间序列打乱。沈从文常常以跳跃性的描写时间的句子跨时间叙事,给人造成一种抒情诗审美呈现的美感。(三)神秘气氛的营构与民族风情的渗透也拓宽了其湘西小说的审美韵味,如《神巫之爱》和《月下小景》之类的小说。(四)在以优美的意象营构圆融的意境的同时,运用大量的比兴、隐喻、象征等手法来暗示故事情节发展的趋向和人物命运,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意蕴。

从原生态叙事到象征态叙事是其生命体验和人生理想导致其创作观念转变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沈从文的经验世界并非田园牧歌般柔曼和谐的诗性景观,其间照样是美丑杂糅善恶并存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五四狂潮的余波涌流到闭塞的湘西时,沈从文才毅然怀着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强烈愿望来到现代文明的大都市北平。然而,当沈从文一接触到北平的都市生活,光怪陆离的都市文明便使来自偏远湘西的他感觉到隔膜与陌生。他为“乡下人实在太少”而“感觉异常孤独。”^{[6](P46)}于是,茫然失措的沈从文始终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来审视他曾经朝思暮想的现代文明社会。他之所以来到北平是因为五四运动的狂潮在他心中激起的强烈追求知识与文明精神的愿望。可是,当他真正穿梭于曾经心向往之的现代大都市时,才猛然省悟,都市文明也并非如其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完美。由于湘西原始文化的本真形态已化作了生命的血液,贯注到了他的心态与行为方式中,因此在他的眼中,矫虚浮华的都市文明所固有的弊端便如显微镜下的虱子般昭彰显明。当时中国都市那种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杂糅,农业文明镶嵌着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畸形状态,使得沈从文对之既非常失望又极其厌恶。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人们,既

不曾悟得西方文化的个中精义,却又独对其中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而又浮躁淫乐的生活倍感兴趣。人们失却乡村社会固有的坦诚。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自私、势利。生命在卑怯苟且庸懦龌龊中消解掉了。湘西纯朴文明的本真形态培养了沈从文坦诚的性格。面对都市文明的这种积弊,他毫不掩饰地指责说:“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了。这并非你们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6](P44)}在沈从文的价值天平上,本真质朴的湘西文化显然优于浮躁虚伪的现代都市文明。于是,他常常理直气壮地以“乡下人”自居,并且平静地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6](P43)}原本满怀信心的沈从文目睹与体验了所谓的现代都市文明的种种流弊之后,愿望之塔倾倒了,理想与希望随风而去。于是,他只好又返回到自己经验世界中的湘西文化。沈从文犹如春暖花开时的蜜蜂一般嗡嗡地转了一大圈仍然回到了原点,此时才发觉,最自然最本真的花朵与生命形态却孕育着最有价值的蜜源。沈从文是由于对湘西文化的不满足,追随五四运动的余波而到现代都市文明中去追求理想,追寻光明的,而现代都市文明的恹恹病态又无情地把沈从文掷回到对湘西文明的体验与追怀中。现代都市文明在沈从文的世界中丑尽其态:“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中,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理发师和成衣师傅,共同弄得到处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那标准。”^{[7](P276)}如果说现代文明确实给予了沈从文些许助益,那么也就在于,现实的丑陋在沈从文经验世界中的效应便是促成沈从文在文学世界中去构筑理想圣殿的契机。而沈从文理想圣殿的构筑只能借取他经验世界中比现代文明更为合理的湘西文化作基石。但是,基石并不能以原本的形态进入沈从文理想圣殿中,因为沈从文经验世界中的湘西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而是美丑杂糅、善恶并存的。既然沈从文在文学中建造的是“希腊神庙”,“这神庙供的是‘人性’”,而承载这种人性的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9](P45)}那么即使是沈从文经验世界中湘西那些原本美丽的生命形态,也必须经理想人性的刀凿修饰才能成为建构那希腊神庙的质料。这种细心精致的修饰既见出沈从文的匠心,又体现了他的执着与虔诚。精心修饰后的艺术世界远离经验世界,它的美丽与庄严,纯朴与素洁已远非经验世界可比。虽然我们轻叩门窗,能够依稀辨出沈从文经验世界中的某些痕迹,但这是神庙,不是原生态的经验世界。这神庙是来源于沈从文的经验中的湘西世界,而又远远地超越了他经验中的湘西世界,它的诗性品质从根本上说是沈从文对其经验世界的象征。正如沈从文自己声称的:“文学是用生活作为依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

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去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8](P8)}因此,沈从文的小创作,由早期的原生态叙事到后来的象征态叙事,由前期依据经验世界创作到后来对经验世界的象征,同样只是对创作方式的自由选择。由凭经验世界的原生态叙事到对经验世界的象征态叙事,不但并未损害沈从文创作的意义,而且使得沈从文小说的诗性品质达到了一种极至境界。

哲理诗性:情的潜沉与智的升腾——从象征叙事到观念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最有成就的作品呈现为原生态叙事与象征叙事两种类型,它们都有一个显明突出的特征,那就是这些小说都弥漫着一种浓浓的抒情的诗性色彩。它们只存在对经验世界组织方式的差异,而在营构小说的诗性本质上却殊途同归。尤其是象征态作品那种超越经验世界的象征叙事,更能充分发挥其呈现具有诗意的理想世界的优长。沈从文在《短篇小说》一文中将作品呈现世界分为两种现象:“小说包含了两部分,一是社会现象,一是梦的现象。小说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9](P14)}社会现象就是作家的经验世界,梦从本质上说,就是对经验世界的象征与超越。正是以象征叙事经营经验世界的方式才使得沈从文梦幻般的最高理想——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神庙”的愿望和标准在《月下小景》、《边城》等作品中得以诗意地言说与呈现。沈从文高标人性以及不悖于人性的“生命形式”是因为现实的丑陋,是苦于湘西世界中原生态的人性和生命形式的不完美以及都市现代文明对人性和生命形式的扭曲。也正因为此,理想主义的沈从文才想到在文学的天地里去重塑一个理想的标准:“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中,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理发师和成衣师傅,共同弄得到处是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那标准。因为不管别的如何,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沈从文当然可以树立他理想人性和人生形式的标准。事实上,以象征叙事方式来营构故事又的确确实使得沈从文的人性理想在《边城》等小说中得以悬空高举,他崇奉和筹建的供奉人性的“希腊神庙”也得以建立了。但理想毕竟只是理想,他可以照亮人生世界,却并不是托塔李天王的宝塔能把世界罩于其下,将恶德除去,让美与善留下。因而,即使如沈从文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不能总是居住在他自己理想化、诗意化的“希腊神庙”中。他终归要面对自己百般痛心与厌恶的现实世界。好友胡也频、徐志摩的无端死去,丁玲的突然失踪,使理想主义者的沈从文从这些天灾人祸中领略到了人生的无常与现实的黑暗。但这并没有致使沈从文放弃理想的追寻与构筑,更没有将他推离出对经验世界的象征叙事模式。因为,虽然现实中,现代都

市文明丑陋不堪,但经验世界中的湘西仍值得追怀。因而,《边城》才能在这几年构思成熟。1933年冬,凝聚了沈从文最高理想,最能体现其小说创作的诗性品质的《边城》已开始动笔。但就在这时,沈从文收到了母亲病情转重,要他回家探母的家信。正是这次回家探母,致使他经验世界中湘西神话的破损。“二十余年如一梦,醒来事事堪惊。”沈从文离家只有十一年,家乡许多东西似乎已是面目全非。湘西社会原先所固有的坦诚、真率、执着、正直的人性与生命形态曾几何时烟消云散了。表面上有了进步的纷纭人事却隐蔽着可悲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性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0](P2k)}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象汉族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11](P129)}现代都市文明的奢靡习气带坏了湘西的年轻人。他们热衷于吸大炮台和三五牌烟,衣襟上插支自来水笔,戴着白金手表和大黑眼镜,吹吹口琴,唱唱京戏,玩玩扑克牌和手电筒,精神上则学会了不少政治八股,交际世故,一般学生则以读点政治经济小册子,知道一些文坛消息、名人轶事为满足。而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妇女那种“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氛”的本真为人,在这些青年人身上却难以寻觅踪影了。现实中湘西社会的堕落趋势是如此令人惊心动魄,与沈从文经验世界中的湘西社会曾经拥有的那种自然而本真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老一辈的自然人性在青年一代身上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那些美好的品质将随着老一辈的衰老死亡而流逝。沈从文曾经引以为豪,可当作建造希腊神庙的质料(那种原始而又本真的人性和生命形式)也将从湘西社会消失。沈从文仅有的那点希望,此时仿佛是悬崖边美丽的花朵,随时会被风裹挟而去。因而记叙沈从文此次回家途中见闻的散文《湘行散记》和那些写给张兆和的《湘行书简》,虽然继续保留着优美的色彩,但与《从文自传》相比却明显地多了一份对湘西原有的那种田园牧歌般自然本真的人性与生命形式将要逝去的挽歌情怀。幽默风雅的笔调里隐藏着深沉的悲哀与焦灼。理想是美好的,理想又是脆弱的,尤其是当它原先得以建立的那些根基与质料逐渐被残酷现实消磨与殒损的时候,理想主义者的沈从文怎么会不心酸滴血呢?湘西大多数新一代青年如不孝的败家子一样,呈现出堕落的趋势了。好在还有一些青年军人还能秉承前辈那种勇敢执拗而又刚韧的性格。这使沈从文尚看到一丝希望,获得些许慰藉。但是,湘西社会普遍的堕落趋势又使沈从文深深地意识到都市现代文明对湘西的侵害。现代文明的浮华奢侈、虚伪堕落的生活态度已经占据了湘西文明薪火相传者的心灵。严峻的现实导致了沈从文创作路向的调整,同时也影响了他正在创作的《边城》。虽然《边城》的构思和动笔是在此次回乡之前,象征态的小说经营方式也已经确定,但小说中那种淡淡的忧伤和淡淡的希望却仍然显露出了其受

到这次回乡的影响的迹象,也强化了这部小说的诗性色彩。“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理想和希望如烟似幻的不确定性影射出了沈从文一些悲哀与挽歌情怀。《边城》是在沈从文回家探母之前动笔,在返回北平之后完成的。由于象征叙事的小说经营在沈从文未面对令其伤心的现实之前先已确定,故事的构架也早已完成,因此,那种超越经验世界的象征叙事形态并未因此次回乡而受到影响,那种浓烟密雾般的抒情诗性品质依旧贯穿《边城》始终。然而,此次回乡探母所目睹耳闻的湘西世界的堕落趋势又促使沈从文意识到他贯常所厌恶的现代都市文明已流毒湘西那原先固有的本真质朴的人性生命形态。当沈从文以理想的“希腊神庙”来观照和审视现实中的湘西社会时,原先固有的经验世界与现实人性的堕落趋势的巨大反差,理想与现实,象征态的超经验世界与他所面对的湘西当前社会景观天壤之别的背反趋向,深深地震撼了沈从文。理想的“希腊神庙”既然已高举耸立,那么如何促使现实中人性返璞归真到神庙纯净的殿堂则是摆在沈从文面前的迫切任务与新的命题。既然湘西社会原先固有的那种本真质朴的人性生命形式的流逝,整个社会呈现堕落趋势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文化、封建文化与充满着奢靡腐化风气的商业文明相杂糅的都市现代文化的侵入,那么为了保存与捍卫湘西世界原有的那种自然本真的文化形态,就必须无情地揭露与剖析都市现代文明繁荣外表包裹下的淫乐、无聊与奢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虚伪、矫情、自私与势利。抒写理想的象征态叙事那种温柔的牧歌式的诗意笔调也难胜任揭露与剖析社会的解剖刀的效用,代之而来的便是富于逻辑与思辨色彩的观念叙事。

其实,沈从文于1933年写的《论中国创作小说》中已触及到观念叙事的问题。文章称:“王统照的作品是同他的诗一样,被人认为神秘的朦胧的。使语体文向富丽华美上努力,同时在文字中,不缺少新的倾向,这所谓‘哲学的’象征的抒情,在王统照的《黄昏》《一叶》两个作品上,好处实为同时其他作家所不及。”^{[6](P169)}“哲学的”又是“象征的”抒情表明,在沈从文看来,王统照的小说既蕴含着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对经验世界的象征和超越的象征叙事形态,又兼具观念叙事特征。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属于叙述文体范畴。因此,哪怕它涵容怎么多样的文体因素于其中,又哪怕它笼罩着怎么浓郁的诗性特征或思辨品格,它也以难以脱离叙事的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沈从文小说的经营方式统称为叙事。所以,所谓观念叙事,就是以抽象的思辨处理经验世界,经营小说的叙述方式。沈从文以1934年那次回家探母为界,由象征叙事向观念叙事转变。这种叙事形态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已经萌芽。小说在极力描写媚金和豹子爱情的纯洁忠贞的同时,不时以一种感叹笔调来评论当前社会种种堕落虚伪,这些点睛之笔隐隐透出观念态叙事的迹象。1934年底创作的《知识》以讽刺笔调写一位湘西青年用家里的钱跑到城市里去上学,学到的是城里人的势利虚荣,却把湘西人应有的自然本真品质性遗失无余。

这篇小说的观念态叙事特征非常明显,但诗性因素却不太浓郁。到《如蕤集》、《小砦及其它》就已经较为成熟,《长河》则是此类小说的代表。在1934年到1947年间,沈从文大部分湘西小说的纯粹的抒情特征和诗性因素逐渐减弱,那种象征叙事经营小说的因素逐渐减退。理想化的超经验叙事形态那种悬空高举的诗性品质也逐渐隐退,走向观念化的思辨型叙事形态。写于1937年的《小砦》虽然是一篇未写完的小说,但这篇小说所呈现的湘西的人事已与《边城》以前的表现同类题材的小说明显不同。《小砦》中的湘西世界已经变得非常世俗。小砦的景色依然优美,可是物是人非。《边城》等小说那种熙熙和乐、平等相处的人际关系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小砦不但贫富悬殊,而且人与人之间也极不平等。住洞穴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极穷苦,极平凡,甚至于还极愚蠢,无望无助地活下去。住在街上的小生意人则卖饮食供人吃喝,卖鸦片烟,麻醉人灵魂也毁坏人身体。妓女们则卖下体解除船上人的疲乏。“住码头上人的生活却宽广得多,同时也堕落的多。”“这地方商业和人民体力与道德,都似乎在崩溃,向不可救药的一方滑去。”^{[10](P182)}《边城》中呈现的那种平等和谐、相处融洽的人际关系已不见踪影,代之而起的是森严的等级和以强凌弱仗势欺人的势利与暴虐。小说的主人公,十二岁的黑子是局长的勤务兵。黑子调皮好玩并且做事常常不合局长的心意,因而经常挨挑剔的局长的恶骂。但黑子一到外面,凭着他在局里当差,人们对他敬让三分,黑子还常常可以凭其身份占点小便宜。鼻涕虫的老娘买杨氏的鸡因价格稍贵而指桑骂槐,以至于跟杨氏唇枪舌剑,弄得火药味十足。《贵生》中的贵生是一个很勤快的后生,人虽穷,但穷得硬朗自重,人缘又极好。但他心爱的女人最后还是被虚伪狡诈有钱而又风流的四爷捷足先登讨作偏房。沈从文虽然揭示了湘西原有的那种勇敢果断精神在贵生身上的流逝,但更为重要的是揭露了三十年代的湘西社会的所谓的上层阶级已经变得腐败虚伪与堕落。《张大相》中的张大相用家里的钱买了一个参谋的空头职位,自己雇了一个勤务兵,整日以玩手电筒为乐,除此以外一无是处。湘西原有的那种勇敢勤奋质朴向上的精神在张大相之类的年轻人身上也已经无影无踪,代表着湘西希望的年轻人也普遍呈现堕落的趋势。《长河·题记》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沈从文湘西小说创作趋向的转变:“1934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0](P2)}“《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屈曲失去了

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19](P4)} 正因如此,《长河》中虽然也刻画了滕长顺和天天父女等人物性情的天真纯粹,素朴真诚,其所生活的环境中的自然景象也不乏明丽爽朗的抒情特征,但除此以外的社会人事则不免黯淡无光。尤其是笔下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连年战争给湘西乡村社会带来的是等级观念、特权制度、狡诈虚伪以及一切所谓的文明社会所有的堕落腐化事物,湘西原有的那种自然本真的生命形态几乎丧失殆尽。对湘西自然质朴的人生形态极其熟悉的老水手在目睹了湘西社会所经历的人事变化之后发出了无奈的感叹:“天天,依我想,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好碗容易打破,好花容易冻死,——好人不会长寿。好人不长寿,恶汉活千年,天下事难说!”^{[10](P171)} 这种富有哲理的感叹包含着感伤、惋惜和更多的无奈。在沈从文后期的小说创作中,诸如此类的对湘西乃至人类生命的深刻反思弥漫于其中,充满着诗性的哲理思辩的光辉。

当然我们的考察只是就主导倾向而言的,因为,即使在后期乃至观念态叙事极其明显的作品中,也会夹杂着其他形态的叙事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沈从文后期的小说创作还存在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的个别作品,也只能是前期小说创作的延续,并不影响此期观念态叙事的主导特征。正因为此期创作的趋势为观念叙事的逐渐增强,又由于观念叙事与原生态叙事,特别是前期最突出的象征叙事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此期小说在文体形式的美学特质上也与以前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最大最突出的趋向就是抒情诗性的逐渐减弱,哲理思辩的特征日益增强,由于观念叙事在某些小说中贯穿前后,终于导致前期作品中曾经最为

明显的抒情诗性品性在这些作品中微如萤火,退隐到强烈的思辩色彩中去了。沈从文这两种类型的诗性小说在审美维度上的差别在于:一是注重意境的营构,一是侧重于哲理的升华;一是理想的,一是现实的;一感性的,一是理性的;一是颂歌型,一是批判反思型;一是抒情的,一是思辩的。

参考文献:

- [1] 吴晓东,等. 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阈[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 (1).
- [2] 沈从文. 从文自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3]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3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2.
- [4] [德]海德格尔. 人,诗意地安居[M]. 郅元宝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 [5]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2.
- [6]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2.
- [7]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2.
- [8]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9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2.
- [9]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2.
- [10]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7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2.
- [11] 沈从文. 沈从文别集·龙朱集[M]. 长沙:岳麓书社, 1992.

Poetic Pursuit: On Poetic Narration in Shen Congwen's Native Novels

CHEN Xue-z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poetic features in Shen Congwen's Xiangxi native novels: poetic lyric and poetic philosophy. In Shen Congwen's early and middle works, poetic lyric is achieved by primitive and symbolic narration; in his later works, poetic philosophy is achieved by conceptual narration, with deep meditation and intellectual wisdom on criticism. One might well say that there is supreme artistic beauty of the Tang poems in his early and middle works, and a supreme rational beauty of the Song poems in his later works.

Key words: poetic lyric; poetic philosophy; primitive narration; symbolic narration; conceptual narration